

迪克·弗朗西斯侦探小说系列
Dick Francis

吴晓辉 译



面具

群众出版社

迪克·弗朗西斯侦探小说系列



(英) 迪克·弗朗西斯 著
吴晓辉 吴晓珊 译

研从山城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具/(英)弗朗西斯著;吴晓辉,吴晓珊译 . - 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迪克·弗朗西斯侦探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Come to grief

ISBN 7-5014-2184-6

I . 面… II . ①弗… ②吴… ③吴… III .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471 号

责任印制:连生

面 具

[英]迪克·弗朗西斯 著
吴晓辉 吴晓珊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233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184-6/I·878 定价:21.00 元

印数:0001—4000 册

内 容 简 介

原冠军骑师希德·哈利在法庭上指控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有罪。不料，这一举动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各新闻媒体纷纷为他的朋友辩护，报刊上的文章一篇比一篇犀利。就在开庭的那天早上，他朋友的母亲跳楼自杀了，法庭被迫休庭。此后，在他试图澄清事实的日子里，遗憾、失落、心酸与恐惧始终紧紧包围着他……

你瞧，我有这样一位朋友，人见人爱（我叫希德·哈利）。

虽然我的这位朋友深受爱戴，却仍被我推上了被告席。

我已当了近五年的侦探，遇到过无数的麻烦事，有时突如其来的调查结果会让我措手不及，甚至吓得目瞪口呆，总之是我的生活自此永无宁日。

好几天来我都内心痛苦难言，手里掌握着证据，却要在付诸行动与否之间进退维谷。可悲的是，我曾经不相信、试图抵触，继而在愤怒中最终接受了自己的论断。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一场严酷考验，我想我已走过了人类悲哀的每步历

程。我为一个我曾经熟知的人感到悲哀。我曾经一直以为我对他知根知底，却没想到他的本性一直是掩盖在虚伪的外表之下。我为我们这段失落的友谊感到悲哀，我为这个看上去一如既往但其实已变得面目全非的人感到悲哀。对我而言，他与死人毫无二致，我为此而感到悲哀。

此事曝光之后，我不仅为自己内心的苦楚备受折磨，外界势力群起围攻更给我雪上加霜。各新闻媒体一跃而起，全力为他辩护，让我这个原告颇过了一段痛苦难捱的日子。我前半生大多是在赛马场上度过的，当时认得的诸多老朋友均弃我而去。我那位朋友得到的是爱、支持与安慰，而我陆续承受的却是内心里铺天盖地的不相信、抵触和愤怒：我的论断要被接受真是长路漫漫啊。同时，是我而非他成为人们仇恨的靶子。我知道这一切终会过去的，我需要的是忍耐和等待。

在他开庭受审的那天早上，他母亲跳楼自杀了。

这个消息传到法庭时，正襟危坐的首席法官已听完了开庭宣言，而我作为原告，正孤零零一人坐在阴森森的侧屋里等待传讯。不久，一位官员走进来告诉我她自杀的消息，并称大法官已宣布休庭，我可以回家了。

“可怜的老太太。”我的确为这消息感到震惊，不禁叫了出来。

第一章

尽管他理应公正，但这位官员仍是倾向于同情被告，他没好气地瞧了我一眼，说我应该明天早上 10 点整再来一趟。

我走出房间，沿着走廊慢慢地踱向出口。途中被一位高级律师截住，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一旁。

“他母亲在旅馆订了一间房，从 16 层楼上跳了下来，”他开门见山地说道，“她留了张字条，说未来对于她来说是不堪忍受的。你对此有何想法？”

我盯着戴维斯·泰塔姆充满睿智的黑眼睛，他的身体因发胖而显得有点笨拙，可脑子却是敏捷得很。

“这点你比我清楚得多。”我说。

“希德！”他勃然大怒道，“告诉我你的想法。”

“也许他会撤回诉讼的。”

他的神经顿时松弛下来，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你真不该干这一行的。”

我苦笑道：“本来是我捉住的鱼，却让你们

给兜走了。”

他轻轻放开了我的胳膊。我继续往外走，去赶30分钟后抵达伦敦的火车，然后叫上一辆的士，坐上一公里便可以到家了。

吉妮·昆特，我在驶往伦敦的路上思绪万千，可怜的，可怜的吉妮·昆特，因难以忍受他儿子那必定折磨她终身的耻辱而选择了死亡，生命之门就这样砰地关在身后，孤独地走远了，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

出租车在彭特广场（加多干广场）外我所住的公寓楼前停住了。我现在住在二楼，带有一个阳台，可以俯瞰广场中央那座绿草葱葱的花园。这座设计得小巧玲珑的花园静谧依旧，几乎没有车辆来往，行人也是屈指可数。早秋十月的微风吹拂着挂在残树上的败叶，飘落到广场上，就像是软绵绵的黄色雪花。

我从出租车里钻出来，从敞开的窗户给司机递过钱去。我穿过马路，刚往门口走了几步，一个刚才显然是不动声色地从我身边悄然而过的男人突然间怒气冲冲地向我扑过来，举起一根长长的黑色金属棒朝我迎头痛击而来。

我没看到，却感觉到了这一棒的来临，于是迅速闪了一下身，我的头躲过了它的袭击，这一棒却重重落在了我的肩上。他朝我咆哮而来，几乎失去了理智。我抬起前臂自卫，又重重挨了一下。后来我用手钳住他的腰，用腿使劲往他后膝

盖上一顶，他的身体便往后一仰，倒在了地上，铁棒亦滚落在地。他嘴里骂着难听的话，前言不搭后语地破口大骂，恐吓着说要杀了我。

出租车还停在那儿。柴油发动机已启动了，司机却还呆在那儿瞠目结舌地看着。我猛地拉开车后门，跌跌撞撞地倒在座位上，心吓得怦怦直跳。

“开车，”我急促地说道，“继续往前走。”

“可……”

“尽管开好了。在他站起身来打碎你的车窗玻璃前还是赶紧往前开吧。”

司机闭上嘴，踩足了油门往前驶去。路边响起了跑步声，他不寒而栗。

“你看，”他转过头来不满地对我说，“我可什么也没看见。你是我今天最后一名乘客，我这已是超时载客了。我正往回家的路上赶呢。”

“尽管开好了。”我有气无力地说道，心里像挂了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的。

“好吧……可是，往哪儿开呢？”

问得好。这我还真得好好想一想。

“他看起来与暴徒没什么两样，”出租车司机愤愤不平地说道，“可这年头你又没法说得清楚。你难道不想让我把你载到警察局去吗？他把你身体哪个部位打折了吧？我能听出那声音来，好像是弄折了你的胳膊。”

“尽管开，好不好？”

司机块头很大，五十岁左右，是个地道的伦敦人。我从车后镜里瞧见他的面部表情以及频繁朝我投来的钉子般的眼神，一看就知道他不想卷入我的事非，也无意让我在他的车中久留。

待我的心绪逐渐平静下来后，我所能想起的也就只有一个地方可去了。我过去曾遇到诸多麻烦，那儿是我唯一的避风港。

“帕丁东。”我说道，“请到帕丁东。”

“你是指圣玛丽医院？去医院？”

“不，我是指火车站。”

“你不是刚从那儿过来吗？”我的话激起他强烈的反应。

“没错，请再绕回去吧。”

他面带喜色，猛地来了个 U 形大转弯，开始往帕丁东火车站赶。一路上他还一个劲地向我保证他什么也没看见，也啥都没听见，他亦无意卷入此事，还问我明不明白。

我也没多说，把钱付给他就让他走了。如果说我记下了他的车号，那也是习惯使然，倒不是期望他今后还能派上什么用场。

我腰上别着一个手机，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必备品了。我信步踱入车厢间的通风处，按下号码接通了这个世界上我最信赖的朋友——我前妻之父查尔斯·罗朗，皇家海军退役军人。铃响第二遍时他接了，让我大大舒了一口气。

“查尔斯，”我说，我的声音有些发哑，远非

我本意所致。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然后查尔斯的声音响起来：“是你吗，希德？”

“我能……来拜访您吗？”

“当然了。你在哪儿？”

“帕丁东，我坐火车再搭出租车过来。”

他不动声色地说道：“从侧门进，侧门没有上锁。”然后撂下了电话。

我笑了。他的沉着稳健及言简意赅让我有所释然。他是一个不感情用事、城府极深的人。他对我没有慈父之爱，也绝非溺爱。但我心知肚明的是，他十分关心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只要我有所需，他总会给予坚如磐石的帮助。比如现在，为情势所迫，我不得不再度求助于他。

中午去牛津的车较少。我抵达牛津坐上出租车时，已是下午4点了。赶到查尔斯那所坐落在爱恩斯福特的颇有一些历史的大房子后，我在侧门下了车。伤口此时已近乎麻痹，我举止笨拙地付了钱，如释重负地走进了这所我真正视之为家的房子。在我这时常遭受捉弄的人生中，这里是我惟一不变的避风港。

查尔斯像往常一样坐在一张大皮椅中。我觉得这椅子太硬，坐着根本不舒服。而他却固执己见，认为这种椅子对他瘦小的身材来说恰到好处。曾有一次我从起居室搬来一张古色古香的锦缎软扶椅，放到他这间所谓的“更衣室”里。我

们俩独处时便通常坐在这儿。这里还搁着他的书桌，他的海底生物标本，他的海事书，架上还摆满了价值连城的古典音乐唱片以及一台精致的唱机。墨绿色的墙上还挂着他曾指挥过的那艘舰艇的巨幅照片，以及同船水手的小幅照片。不久前他还挂起了我在赤尔但汉驾马飞越障碍物的一幅画像。画像中的我聚敛了赛马中所需的每一分活力。其实它已在餐厅颇为显眼的地方挂了好几年。

他在那个沉重的金框上面饰上了一排灯。我进来时，灯正亮着。

他在读书，看见我进来便把书的封面朝下放到膝盖上，毫不掩饰地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个够。他眼里依然空空如也：我通常是能够看透别人心思的，可在他身上很少行得通。

“你好。”他说。

我听见他吸了口气，又从鼻子里吐了出来。他审视我足有五分钟，才用手指了指我画像下头的桌子，那上面放着一个盘子，里面有酒瓶和酒杯。

“喝点酒。”他也不跟我啰嗦，语气显然是命令而非邀请。

“现在才4点。”

“这又不是正餐。你今天都吃什么了？”

我一言未发，这已是最好的回答了。

“什么也没吃。”他点点头说道，“我早料到

了。你看上去瘦了。都怪这个该死的案子。我还以为今天你该上法庭了呢。”

“推迟到明天了。”

“喝杯酒吧。”

我顺从地走到桌旁，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些酒瓶。他是个守旧的人，通常把白兰地和葡萄酒装在细颈玻璃瓶里。他最喜欢的苏格兰名牌松鸡酒仍放在拧盖酒瓶里。我想我只能来点苏格兰酒了，我连自己有没有力气倒酒都感到怀疑。

我抬头望到我的画像。六年前，我还有两只手。那时候我是英国越野赛马冠军。完整、健康，而且称得上狂热。可转瞬间噩梦来临，马失前蹄使我的左手几乎断裂：为我的赛马生涯划上一个句号，也启了另一种生活之门，如果说不为过的话。这之后的两年中，我陷于自身的失落无法自拔，就像一艘无舵的破船，虽然尚未沉没，但已失却了航行的价值。我为这两年的虚度感到羞耻。最终，一个狂恶不羁的暴徒把我的伤手毁至残疾，让我翻然醒悟，唤起心中的一股冲动，要从我那只几乎能以假乱真的手中挖掘出我生命的潜力。

我现在的问题是拇指不能张得太开来拿住那又大又重的白兰地酒瓶，我的右手也不太灵便。为了不把酒洒到查尔斯的波斯地毯上，我只好放弃努力，坐回镀金扶手椅里。

“怎么回事？”查尔斯很唐突地问道，“你来

这儿有什么事？干吗不来杯酒？”

我知道说出来会伤害他，于是过了好一会儿才索然地说道：“吉妮·昆特自杀了。”

“什么？”

“今天早上，”我说，“她从 16 层楼上跳了下来。”

他轮廓分明的脸庞顿时变得很僵硬，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茫然的眼睛刹时暗淡无光，仿佛一下子蜷缩进了眼窝里。查尔斯认识吉妮·昆特已 30 多年了，他很喜欢她，也是她家的常客。

那些难忘的记忆也留在我的脑子里。她友好、善良、富有母爱、以当家庭妇女为乐，富有而不以此自我炫耀，认真而慷慨地为好几个慈善事业工作，也时常沐浴在她那著名的、英俊的、事业有成的、人见人爱的儿子的耀眼光芒中喜不自禁。

她的儿子，是我把他送到被告席上去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吉妮时，她用不可置信的目光轻蔑地盯着我，似在追究我何以要毁掉正处飞黄腾达的艾利斯。艾利斯视我为其友，喜欢我，帮过我的忙，愿以生命来相信我。

我任凭她朝我宣泄她的愤怒，也不去做什么辩解。我对她的想法心知肚明。不信任、抵触、气愤……我指责他的所作所为让她如此恶心，以至于她完全摒弃了他儿子犯罪的可能性，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在她身上亦不乏焦虑的痕迹。

大部分人都认为我完全搞错了，我也为此毁掉了自己。连查尔斯起初也将信将疑地问：“希德，你肯定？”

我说我对此确信无疑。我竭尽全力想寻求出路……任何出路都行……因为我深知如果我一意孤行，定会自栽跟头。最终一切果如我所料的那样糟糕，在很多情况下更是变本加厉。第一个解决方案如惊雷般出台后——这是针对一个几乎大半个国家都在血泪声讨的案子（可这不是艾利斯的血，不，不，这太不堪想像了）——艾利斯第一次在法庭上公开露面，被押送入狱（他犯罪纯属谣言，他理应被立即保释出狱）。这之后舆论界突然一片沉寂，附属审判法随即应运而生。

英国的附属审判法规定，罪犯在押至开庭审判期间，禁止公开议论任何有关犯罪的证据。许多调查与审判之运筹帷幄可于幕后进行，任何陪审员或走在街道上的任何公民都禁止得知任何细节。舆论界亦被同化，结果便死咬住“艾利斯是无辜的”定论不放，我也为此几乎整整受了三个月的叱骂。

大家都知道，艾利斯·昆特一度曾是业余赛马冠军，后来喜剧般地成为电视上的热门人物。他是一位出色、开心、能干、逗乐的电视制作人。他的体育猜谜节目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他是谈天说地节目的主持人，是孩子们心中崇拜的偶像，是往往能让举国为之开心的耀眼明星，

是不论凡夫俗子还是达官贵人都乐于接受的人物。

制造商对他趋之若鹜，诱使他接受他们的产品。英国有一半以上的孩子都学他身着牛仔服，脚踏魅力四射的赛马鞋，迈开大步以显示男子汉气概。我想干掉的就是这样一位模范人物。

没有人责备那位曾轰动一时的专栏作家。他写道：“那位曾受人尊重的希德·哈利，妒火焚烧，想毁掉一个他根本无法媲美的天才……”诸如“一个令人唾弃的小人想方设法要弥补他自身的缺陷”的侮辱之词不一而足。我没有把其中任何一篇拿给查尔斯看，但其他人拿给他看过。

我腰际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我拿起来回话。

“希德……希德……”

电话那头的女人在哭泣。她的哭声对我来说已是司空见惯。

“你在家吗？”我问道。

“不……我在医院。”

“告诉我号码，我这就给你打过去。”

我听到电话里有人在窃窃私语，然后又有一个声音在耳旁响起，口齿伶俐但不乏稳健地念了一个号码，又缓慢地重复了一遍。我把它输入我的手机，这几个号码便出现在那小小的显示屏上。

“好了，”我说道，又把号码重复了一次，“放下电话吧。”我对查尔斯说：“能借你电话一

用吗？”

他朝桌子那边指指以示许可，我在他的电话机上按下号码，接通了电话。

那个口齿伶俐的声音随即答话了。

“芬斯太太还在吗？”我问。“我是希德·哈利。”

“稍等。”

琳达·芬斯强忍着不让自己哭泣。“希德……拉切尔的病情又恶化了。她要见你，你能来吗？求你。”

“情况坏到什么程度了？”

“她的体温持续升高，”一阵啜泣使她戛然而止，“跟格兰特修女说吧。”

我跟那个口齿伶俐的格兰特修女谈了起来。“拉切尔的病情坏到了什么程度？”

“她一直在说想见你，”她说，“你多快能赶来？”

“明天。”

“你今晚能来吗？”

我说：“情况有那么糟糕吗？”

电话那头好一阵沉默，她无法如实道出，因为琳达就在身旁。

“今晚来吧。”她重复道。

今晚，天哪。九岁的拉切尔·芬斯躺在离这里150公里的肯特的医院中，已经濒临死亡，听起来时候已差不多了。